



赤裸裸的运毒信息出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,暴露网络监管漏洞

警惕网络“高薪招聘”成为青年运毒陷阱

不妨让婚恋规划成为一门必修课

□ 胡波(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)

前不久,民法典关于“离婚冷静期”的设置,引发社会广泛关注,仅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就高达12.9亿次。

我注意到,有不少网友建议,既然有“离婚冷静期”,更应当设立“结婚冷静期”,因为没有结婚也就不存在着离婚之说,年轻人更应该在结婚之前,认真地思考一下,是不是出于情感“冲动”才决定要结婚的,避免发生一些刚领完证就后悔、酒席都没来得及办就离婚的现象。

当然,这样的逻辑也并不十分严密,结婚和离婚之间有其必然的直接联系,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这其中的因素也更加曲折、复杂。在此,我无意去探讨国家立法层面的合理性,更想从教育系统和社会总体幸福指数的角度去做一些讨论。

应该看到,婚姻的满意度关乎个人和家庭的福祉,而人们总体婚姻的幸福感也会产生累积效应,增加社会总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,离婚率的不断走高,从隐性层面来说,就可能意味着社会总体幸福指数的降低。

比尔·盖茨曾谈过他的投资观,他认为,人生最重要的投资就是婚姻。但人们对婚姻问题的讨论,却从来不像讨论GDP那样给予更多的关注。更具象一点说,很多人更愿意思考怎么去投资股票,怎么去买理财产品,而且讲起来也头头是道,却很少愿意思考怎么让自己未来的婚姻生活更加幸福美满。

如果说人生前半段的十几年时间都在学校里接受知识的灌输,后半段实际面对的除了工作问题,更多的是生活问题、家庭问题,然而,对于我们的人生极为重要的婚姻问题,教育却是从来都不会过问的,更多的是靠个人“自学成才”。平心而论,在学校学习的生涯中,我们更喜欢讨论职业生涯规划,并且将之纳入就业和创业教育系统,很少正大光明地讨论婚姻规划、幸福生活之类的话题,乃至教授这样一门课程,换言之,婚姻生活规划在教育系统中总体是偏废的。

这导致的结果是,与专业知识的系统性、深度性相比,我们对婚姻的认识大都是肤浅的、零散的、碎片化的,或是受到影视作品或小说的片面影响,或是受到家长经验的灌输。然而,时代处在不断变化中,一些父辈的人生经历与年轻人的实际需求之间也存在着错位,老一辈的经验可能存在局限性,并不具备绝对的适用性。

更为尴尬的是,在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的婚姻规划教育的前提下,很多毕业生在离开校园,走上工作岗位之际,就在父母的“催逼”之下,直接面临相亲与结婚的现实要求。现实中,很多人在相亲之前也未必能够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和定位,并不清楚自己究竟该找个什么样的人,遑论接受一些专业方法的指导。

老话常说,男怕入错行,女怕嫁错郎。其实,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,婚姻更是一种战略投资,婚姻失败,离婚就直接意味着财产的分割,不管是对男性,还是对女性而言,都是如此。当然,婚姻也是一种超经济的行为,不是单一的投资与收益这么简单,还需要进行多维度、多方面的考量。毕竟,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是单点对单点的沟通,彼此的关系比较简单,而一旦决定结婚,两个人在一起生活,其实就成了两家人之间的并购。因为关起门来,回归家庭生活,双方都会裹挟着彼此家庭的基因、习惯,乃至思维模式。

说到底,婚恋规划既是一种思想观念,也是一种技法和策略。不同的人对婚恋当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,但是,它应该形成一套融合相亲、恋爱、结婚、感情维系和法律援助等完整、系统的知识体系,并且在直面批评和修正中不断地完善,从而给年轻人提供一些引导和启示。

或许整个教育系统对于婚姻幸福的关注、研究和把握还不够,无法形成有针对性、切合实际需要的课程体系,自然缺乏讲授这门课的自信,又或者主观上认为,婚姻幸福只是家庭和个人的事情,不必作为一门正规的课程系统来教授。但从提高社会总体幸福指数上来,教育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。我们在争论法律规范是否对离婚自由产生限制的同时,也不妨从源头上反思一下,教育对于年轻人的婚恋规划究竟还能够做些什么。

每次1万元,报销车费”“要大胆、听话”,发布这些信息的网名各式各样,甚至还有“黄赌毒一条龙服务”的网名。

这些“月薪8000元至1万元”的信息,吸引了不少找工作、想赚钱青年的关注。他们中有吸毒人员、刑释人员、无业者、身患疾病者、怀孕哺乳期妇女、未成年人等。

在云南师范大学教授、国家禁毒委禁毒专家库成员莫光耀看来,许多年轻人因生存压力大或其他原因铤而走险,陷入贩毒的泥沼。这些问题显示,毒品预防教育还没有得到有效落实,在偏远农村针对流动青少年的教育还是空白;毒品教育措施不够有力,方法较为简单。他认为,在毒品预防教育的同时,还应该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、生命安全和网络安全教育。

据不久前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《2019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》显示,目前,网络贩毒活动突出。2019年共破获网络涉毒案件6957起,抓获犯罪嫌疑人1.2万名,缴获毒品2.9吨。走私贩毒人员携带毒品、当面交易的接触式贩毒模式已越来越少,利用网络虚拟身份勾联、线上交易毒品,采用手机银行、微信、支付宝转账等网络支付方式付款,通过寄递渠道运送毒品的网络贩毒模式已成新常态;为规避公安机关查处,一些吸毒人员利用网络社交软件建立“毒友群”,用虚拟身份、暗语交流,进群后要直播吸毒,不参与直播吸毒,或不购买毒品就被踢出群。

“网络贩毒的新情况已引起云南检察机关的重视。”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沈曙昆说,目前,云南检察机关梳理出境外不法分子引诱犯罪的惯用手段,在被招募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、场所,结合普法教育,法治宣传进校园,运用“两微一端”新媒体,进行广泛的法治宣传教育。

同时,云南检察机关还运用检察建议督促网络社交平台、网络信息搜索发布平台、智能终端即时通信服务平台对其所登载的信息进行自律把关、筛查过滤,并定期向平台用户推送禁毒、防毒相关法律法规政策,加速升级完善敏感信息监测及账户实名认证机制,尽可能清除冒用他人身份注册、一人多号、频繁换号的情况,以此来降低网络招募的风险。

业的青年被网络上“高薪招聘”“快速赚钱”等信息诱骗,被犯罪集团安排偷越国境至缅甸后,遭到强行扣留手机和身份证、殴打、练习吞毒品、拍摄视频等威胁,以人体内藏毒、箱包带毒等方式走私、运输毒品进入中国境内的案件增多。青年梁爱强就是其中一名。

2018年4月底,梁爱强在百度上输入“如何来钱快”的字样,很快,就有人联系他说“不杀人放火,保底2万元,可以给订票”。同年5月2日,在对方的安排下,梁爱强偷渡到缅甸南邓,与他联系的男子是石扎阿发犯罪集团的主要骨干,他和另外10余人把梁爱强带到一栋民房,两天后,要求他吞毒品,梁爱强拒绝,被对方殴打,被迫吞了57颗海洛因,在偷渡入境到云南凤庆县途中被警方抓获。

2018年5月,青年李雨(化名)在QQ群里认识了一个人,此人告诉李雨说云南有跟车的活儿,每月五六千元的收入。在对方的安排下,李雨从上海坐火车到昆明,之后偷渡到缅甸小勐拉。知道上当后的李雨坚持不吞毒品不带货,被刘永萍犯罪集团的人员捆绑在凳子上,砍刀架在他脖子上,让他用微信视频和父亲通话,要求转账10万,并且不许报警,李雨的父亲先转5000元给他,加上李雨向苏州朋友借的3000元,对方才把李雨和另一名吞了毒品的人员送回中国。临行前还让他们对着手机录下视频说:“这是毒品海洛因,是自愿带回中国的。”

检察建议督促网络社交平台自律

“大量青年被诱骗到境外运毒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。”作为石扎阿发的二审辩护人,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、云南省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李春光指出,“赤裸裸的运毒信息出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,暴露出网络监管的漏洞”。

根据多名被告人陈述,只要在QQ里输入“缺钱”“来钱快,快速上岸”等词,就可以加入到“贷款群”“兼职群”“带货签单”“走投无路”“借贷群”“缺钱一票”等群内,群里发布的招募信息内容有:“急招出差人员,薪酬1万,没有胃病,肠炎,年龄20岁左右,体重不低于100斤”“到云南带货,

集团在QQ、微信、贴吧等社交平台发布“高薪招聘”“带货快速赚钱”等虚假信息,组织、招募、诱骗大批中国公民经西双版纳州打洛、勐龙边境小镇偷渡至缅甸小勐拉、南板,从事走私、贩卖、运输毒品犯罪22起,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达31人,查获毒品海洛因7128.428克、甲基苯丙胺7714.33克。

据法院审理查明,就在刘永萍大肆招募运毒人员的同时,在与云南临沧市沧源县接壤的缅甸南邓特区,因在四川老家昭觉县新城镇赌博欠债,2018年初偷渡至缅甸骠堡,31岁的石扎阿发也纠集9人,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,以同样的方式,先后诱骗52名中国公民偷越国境,胁迫实施走私、运输毒品犯罪13起,被缴获毒品海洛因12768.44克。

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雪松指出,这些犯罪集团长期依托境外特殊环境,多次组织多人偷越国境后又走私运输毒品入境,且部分毒品已流入社会,严重违反了国家毒品管制规定、扰乱国家边境管理秩序,对人民群众人身安全造成极大威胁,社会影响极其恶劣。

今年5月6日和5月13日,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,被告人石扎阿发、刘永萍、邱梅分别犯走私、贩卖、运输毒品罪、绑架罪、故意伤害罪、非法拘禁罪、敲诈勒索罪、偷越国境罪,判处有期徒刑不等。同时,判处张久朋有期徒刑15年,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不等。

为找工作,深陷运毒泥沼

值得关注的是,被告人石扎阿发等9人黑社会性质组织诱骗、胁迫中国公民走私、运输毒品一案中,有4人为90后;被告人刘永萍、邱梅等16人恶势力犯罪集团跨境走私、贩卖、运输毒品、偷越国境、绑架、敲诈勒索等罪一案中,有12人是90后、95后,1人是00后。而被招募的运毒人员也大多为90后、95后。

“近年来,毒品案件出现了一些新趋势,贩卖、运输毒品的犯罪占比大。”李雪松分析指出,在这其中,无业、寻求就

杨跃乐失去联系后,看守张久朋的人认为杨跃乐吞了他们的货,要张久朋赔钱。张久朋给父亲、亲戚、同事打电话,都没有要到钱和借到钱。2月6日晚,3名男子和一名女子用车将他带到山上捆绑在一棵大树上暴打,并用柴刀砍断他的左手小拇指,拍下视频发给他远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父亲,要求他父亲把10万元打到他们的账户上。

张久朋的父亲以凑钱为借口拖延时间,向派出所报了警。在山上等到第二天中午没拿到钱的几个人,挖坑将张久朋埋了起来,录下的视频发给张久朋的父亲。备受折磨的张久朋恳求与幕后的“大姐”通话,表示愿意为“大姐”做牛做马,把钱还上。眼看张久朋窒息晕了过去,几人把他刨了出来送到医院,把砍断的手指缝合好后带他回到小勐拉。

此后,张久朋就成为了“大姐”的“小弟”,刚开始是削萝卜,削好后拿给其他人练习吞食;之后,他参与了在QQ兼职群的招募并看守被诱骗到缅甸小勐拉运输毒品的人员。在这个团伙里,年龄最小的张久朋常常因为做错事或说错话被殴打,他一直在找机会逃离。

2018年5月的一天,他与两名被骗来运毒的人一起离开缅甸,一路辗转回到老家。同年11月9日下午,张久朋在北京一网吧被警方抓获。

张久朋所称的“大姐”,是贵州省都匀市人、现年51岁的刘永萍。2018年年初,刘永萍偷渡到缅甸小勐拉,在赌场里认识了比她大一岁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人邱梅,她比刘永萍较早偷渡到缅甸小勐拉,靠赌场的洗码费、返点费生活。赌输了钱的邱梅向刘永萍借,借来的钱又赌输。在刘永萍的提议下,邱梅向亲戚朋友借了2万元人民币,两人开始合伙做毒品生意。她们购买毒品,联系毒品买家,安排毒品运输路线,招募纠集人员,每笔交易成功后利润一人一半。刘永萍对团伙内部人员的“奖励”方法是:“网上招募一人得3000元”,“招募来的人吞服毒品并带毒品成功,可再得1000元”;对成功带毒入境到国内的人员给予1万元报酬。

经法院审理查明,自2018年年初至2018年6月,刘永萍等16人恶势力犯罪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

26岁的张长林正在等待二审判决。2019年7月25日,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、运输毒品罪数罪并罚,判处张长林死刑。张长林不服,提起上诉。

两年前,张长林还是江苏某知名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在校大学生。在同学眼里,担任学生干部、学习认真,多次获得奖学金的张长林,“优秀,爱好广泛,热心公益”,“还会编一些小程序赚取生活费”。

然而,自从张长林交上女朋友后,花费增多。为了满足女友想买名牌包的愿望,他在多家不正规网络平台贷款,最终窟窿越来越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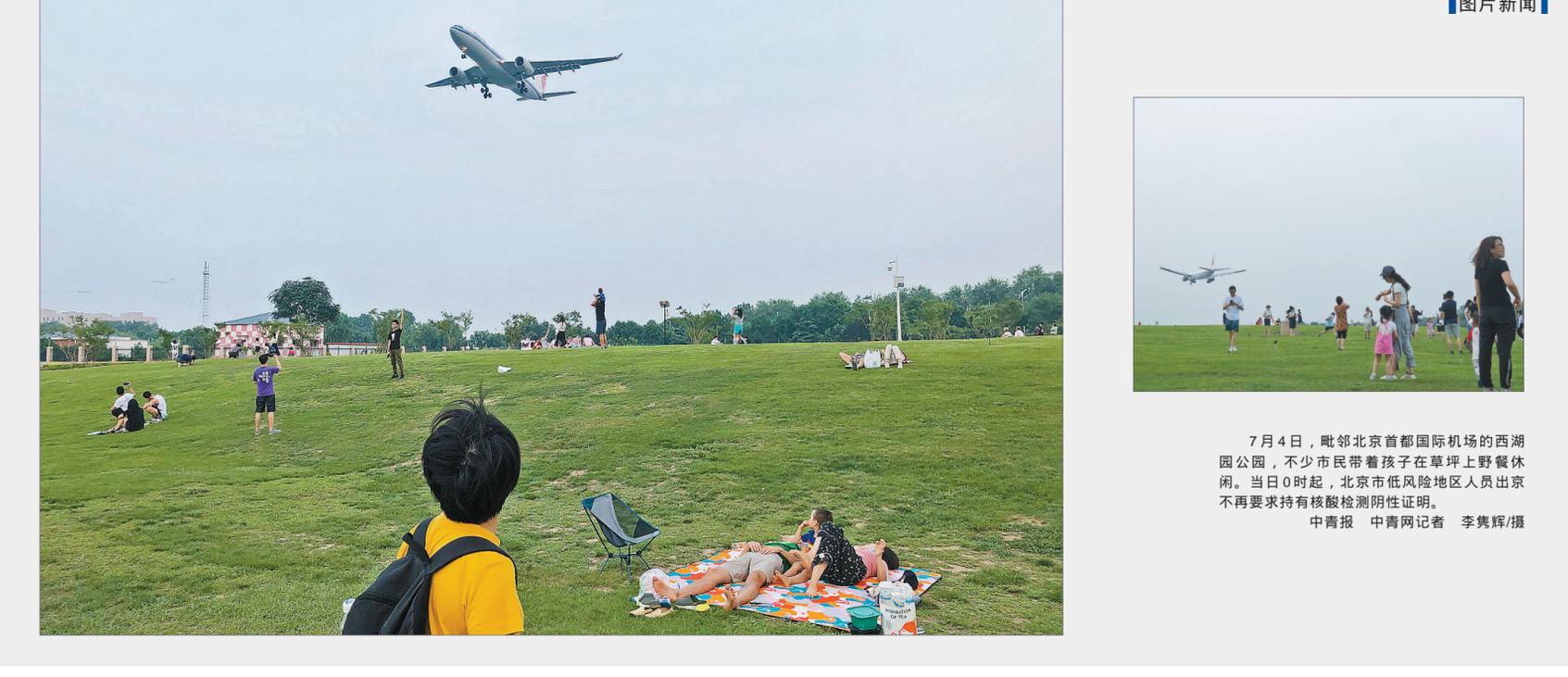
为还清债务,张长林在网上认识了招募运毒人员的“网友”,成为其代理人,在网上招募人员运输毒品。2018年5月13日,张长林与他招募的两人,从西安来到昆明,在昆明一小区准备找“下线”出货,警方在云南曲靖胜境关将其抓获,查获毒品海洛因10495.7克。

“近年来,网络贩毒活动突出,犯罪集团利用境外特殊的区域和社会环境,通过网络招募运输毒品的人员,其中,参与运毒的年轻人日益增多。”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沈曙昆说。

虚假信息诱骗大批中国公民到境外运毒

两年前,22岁的张久朋被朋友杨跃乐骗到缅甸小勐拉,从此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。

那是2018年2月初,张久朋和杨跃乐通过网络招募,经人安排,一路乘飞机、汽车到达云南,从西双版纳州边境偷渡到缅甸小勐拉。当天,他们的手机和身份证被人收走,并被几个陌生人看守了起来。第二天,杨跃乐吞食毒品海洛因后离开。张久朋意识到自己被骗了,却无法脱身。他不知道,两天后即2月6日,杨跃乐在昆明一家商务酒店被民警抓获,从体内排出毒品海洛因81颗,共402.3克。



【图片新闻】

7月4日,毗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西湖园公园,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在草坪上野餐休闲。当日0时起,北京市低风险地区人员出京不再要求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/摄

帮带二孩让大学生在“崩溃”中成长

汤春燕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雷宇

“太辛苦了,要带好一个孩子真是非常难。”在北京读大学的楚楚,自从去年12月底放假回家,至今还未开学,照顾弟弟这么久以后,她感慨做父母太难。

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很多大学生进入了居家学习模式,一些二孩家庭的大学生与年龄差距10多岁的弟弟妹妹、表弟表妹有了全时段的相处机会。帮家长带娃,让这群年轻人迅速成长。

起早贪黑,原来带娃这么累

这段时间,楚楚常被妈妈夸奖是个好姐姐,但她却高兴不起来。弟弟有时早晨5点多醒来,楚楚就要起床准备早餐,陪着3岁的弟弟玩了一上午,下午妈妈又安排她接着照看。

“你不知道我有多辛苦吧?”楚楚气恼地和妈妈吵了起来,家人的赞赏有时会让她怀疑,好像只有带弟弟的时候才有自我价值。在校时,自己是生活的中心,现在却不得不考虑家庭中的角色,全天带娃,难免影响到自己上课学习的时间。

胡齐今年大二,一岁半的弟弟早上6点多就会醒,爬到他的床头拉扯。因为父母一早就出门上班,胡齐为了照顾弟弟完全没办法上早课。第一次给弟弟换纸尿裤时,胡齐对着哭泣的小宝宝手足无措,只能一边电话问妈妈,一边照着做。胡齐有时会同父母,“我小时候也这么调皮吗?”

“当然了,你小时候也一样。”哄弟弟睡觉时,胡齐要抱着他在小房间里一圈一圈地走,有时一抱就是半小时,胳膊都酸了。因为学校要求居家锻炼打卡,胡齐在家里铺好了健身垫,刚刚躺好准备做动作,弟弟就从房间飞奔过来,顺势骑在他身上,然后双手“啪啪”地打他的脸,“真的受不了,小孩子打人不知道轻重”。

“看见切西瓜的刀,弟弟哭闹着要玩,看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弟弟,胡齐的内心有些崩溃。”今年24岁的小芮正在读研究生,有一个比自己小13岁的妹妹,疫情在家,小芮担负了妹妹的学习监督和课后辅导任务。有时候正和朋友聊得开心,妹妹进来问问题,她只好立马停下来给妹妹讲题。有一次正逢生理期,小芮准备回家躺床休息,谁知刚打开家门,就被妹妹叫住,要给她听写语文生词。看着妹妹那么积极的

份儿上,小芮忍着疼痛给她听写完了生词。

科学育儿,妈妈觉得我带得比她好

熟悉楚楚的朋友都知道,她是朋友圈里的“晒娃狂魔”,这一次她更像一个“育儿专家”。待在家中照顾弟弟时,她关注了育儿公众号,看育儿书,同时学习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相关知识。起初,家人并不理解她费心费力“照书养”的做法。

弟弟今年3岁,有些敏感,听到鞭炮的声音都会吓得不行,外公觉得小孩子太胆小了不好,楚楚很不同意:“他就是这个样子的,为什么一定要改变他呢?”

在楚楚看来,胆小也有胆小的好处,不会去做冒险的事。回家后,楚楚发现弟弟喜欢看边看电视边吃饭,决定改掉他这个坏习惯。一开始,弟弟不停哭闹,妈妈也埋怨。楚楚坚持自己的做法,不断转移弟弟看电视的注意力,久而久之,弟弟能够关闭电视独立吃饭了。

“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孩子不乖,是因为父母没有努力去做,他们才觉得没有办法。”帮弟弟养成了更多好习惯,楚楚也

得到了妈妈的认可。

正在读研究生的尹紫有个14岁的弟弟。在她看来,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爸妈的陪伴,弟弟都比自己获得的更多,但父母教育他的严厉程度却不如自己,弟弟的学习习惯比自己更差,也缺少一些坚持的精神。

教弟弟做PPT、学习报、背单词等,弟弟学业上的大事小事都由尹紫来辅导,同时也帮助弟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。尹紫说,父母和自己的教育理念大体上一致,在具体执行上却不够严格,他们总是抱着“做不到就算了”这样的想法。尹紫的想法则是,凡事都要坚持不懈,不能轻言放弃。

陪弟妹成长,我也长大了

胡齐曾经很害怕小孩子,第一次看见小孩子都不敢抱,又轻又软的,觉得一不小心就会碰伤他。换衣服,穿尿裤,喂奶,还要带他玩,现在胡齐带孩子越来越熟练了。

“太累了,太烦了,但是也给我带来很多快乐。”看着弟弟对着自己撒娇,抱着自己的大腿,奶声奶气地叫哥哥,胡齐

觉得很温暖,很治愈,看着弟弟的成长,自己也有满满的成就感。

刚得知自己有弟弟时,楚楚和父母吵了一架,觉得他们没有和自己商量,也没有考虑弟弟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压力。当楚楚第一次主动抱起弟弟时,她突然觉得自己和这个小生命有一种“联结”,心里的感性占据了主导,只想着去陪伴他、照顾他。“我有时候会分不清姐姐和妈妈的角色”,总是想要给弟弟最好的东西,楚楚觉得,她好像把弟弟当成了另外一个自己。

在小芮看来,妹妹的性格和自己大相径庭。自己从小不哭不闹,是别人口中“安静乖巧,听话懂事”的孩子,总被父母教育要谦虚忍让,察言观色,做事也容易犹豫不决。在接受了妹妹和自己性格秉性不同的事实后,她认识到性格不同也不是坏事,教育小孩子还是要因材施教。

最新的网络热点,二次元的“梗”,弟弟比作为大学生的尹紫知道得更多,也因此成了她了解00后的窗口。现在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,都需要年轻化的思维,尹紫觉得弟弟对于自己知识的更新特别有帮助。很多人对生孩子养孩子没概念,尹紫自己亲身体会后,感受到了养育小孩的痛苦,也更明白了家庭的重要性。

“我以后也要生两个孩子。”尹紫肯定地说,两个孩子可以相互扶持,家庭氛围更好,对小朋友共情能力、心理健康等方面都是有好处的。

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的大学生均为化名)